宋允，苏志豪．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社会网络研究——以河南省L县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6）：83-91.
SONG Yun，SU Zhihao.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of economic elites returning rural areas to run businesses —— taking L County，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2，21（6）：83-91.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2.06.008

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社会网络研究
——以河南省L县为例

宋允[1]，苏志豪[2]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 100091；2.惠州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摘 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经济精英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其社会网络资本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河南省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案例，以社会网络为切入点剖析这些经济精英返乡后的成功要素。研究表明，经济精英的返乡创业行动受内在基因和外在契机的交织影响。创业初期以非正式网络为主导，直接影响行业选择、原始积累，且在运营模式上的人情倾向明显；在创业中期，正式关系效用逐渐凸显，形成契约关系推动资金积累、品牌打造与技术革新，由依赖传统人情运营模式转向实用为导向的规范经营；在创业后期，规模扩大使其具备政绩效应与社会效应，虹吸正式社会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深度融入和扎根于当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这一过程系经济精英与在地化社会网络、政策的深度互动，实现企业和产业与当地实际的深度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可从经济精英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形成资本互构耦合效应出发，助力返乡创业。

关键词：返乡创业；经济精英；社会网络；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2）06-0083-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呈现从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向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转移的显著趋势。这种单向度的人口规模化迁移虽有利于加强城市建设水平和增加个体收入，但同时打破了人才在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格局，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衰败。2015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导向下，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渴望通过支持多群体返乡创业助推城乡协调发展。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1]。”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村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消费市场充满潜力。无论是基于某些优惠条件而主动返乡，抑或深受城市生活副作用的压迫而被动返乡，都共同塑造了一股人口逆城市化并以产业振兴乡村的新式浪潮，返乡创业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

创业本身是项复杂的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比如行动者个人的能力、社会关系以及市场环境等。然而有的返乡创业者获得成功，有的却遭受失败，在这之中社会网络起到什么作用？在不同的创业阶段，经济精英的社会网络构成类型有何不同？又呈现何种变化趋势？创业者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存在怎样的互动

收稿日期：2022-03-01 **修回日期：**2022-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编号1ZDA058）
作者简介：宋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

关系？鉴于此，通过对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经历和过程的梳理，从社会网络的视角重点分析其返乡创业的成功要素，对未来进一步引导返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1. 返乡创业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返乡创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角度较为多样，内容相对丰富，大多数研究主体是农民工。目前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概念与内涵。如有学者将返乡创业界定为“农民从农村出县境到城市打工或经商半年以上又返回本县（包括县城、乡镇、村）创办工商企业，包括搞开发农业的活动”[2]。二是动机和逻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有经济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成就性动机[3]，部分农民渴望通过返乡创业冒风险获取高额利益回报，使家庭体面城市化[4]。三是影响因素。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和创业质量受出生年份、性别、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务工经历、创业年限、职业技能水平、干部亲朋、互联网＋创业、政策、居住地教育环境和居住条件、地区消费水平和房价水平等微观和宏观多因素影响[5-7]。四是问题与困境。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受资金不足、贷款困难、缺少项目、培训教育力度不够、公共服务缺位等问题影响[8]。

2. 社会网络与返乡创业

对于返乡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研究，现有文献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视角也存在差异，以下研究观点较有代表性。社会网络的创业价值可概括为三个核心要素，即信息机制、互惠机制、文化认同机制，以及两个支持要素，即组织性和社会联系[9]。在社会网络与产业生态交互赋能下，将社会网络扩大规模、增强密度和提升层次，有助于返乡创业者获得更多要素资源[10]；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能满足创业者需求[11]。在互联网嵌入的视角下，现实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直接正向影响，而虚拟社会资本对其意愿有直接负向、间接正向影响，虚拟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现实社会资本[12]。在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视角下，强关系有助于推动模仿性创业，而弱关系则促进创新性创业[13]；弱关系网络如常联系朋友个数和可借款人数等对农民工获取政府支持有显著影响，而强关系网络如配偶及兄弟姐妹则对返乡农民工获取政府支持影响相对较小[14]。

3. 研究评述

当前的文献多聚焦于经济资本较少的农民工群体返乡创业，少数聚焦于青年大学生群体的返乡创业，但经济精英这一细分群体的重要作用被忽视。实际上，经济精英与农民工、青年学生等群体存在特性差异，通过运用丰富的资源网络，其产业类型选择多元化并能有效地抵御风险，返乡创业成功几率更高。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关于返乡创业现象的研究发生了明显转向。在返乡动力和成功要素上，既研究政策支持、创业氛围、乡村基础设施等外在条件，也注重价值观、资本、技能、创业经历等内在条件。在角色功能上，从精英掠夺和寡头治村思维定势转向挖掘其正向功能，例如提出产业发展型精英注重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均衡[15]，还能培养内生力量和推动乡村善治[16]。在研究范式上，从粗略的宏观分析转向依据理论视角的案例分析[17-19]。

（二）理论分析框架

1. 理论基础

Mitchell指出社会网络是特定人群之间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涵盖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物质环境和文化共享而形成的间接社会关系[20]。创业网络是企业独特的关系网络，是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在创业行为中的嵌入。Birley研究了创业网络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将创业网络分为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21]。Littunen基于Birley的成果进一步对正式和非正式创业网络进行阐明。他认为非正式创业网络以信任为联结纽带，背景较为相似，是与家人、亲戚、朋友等构成的关系网络；正式创业网络是以商务交往利益为基础，以组织为背景，与供应商、竞争对手、行业协会、银行、律师、税务局、中介机构等建立的关系网络[22]。

2. 分析框架

创业阶段视角对梳理经济精英的返乡现象具备一定的适用性。返乡创业行为存在类似的发展

周期，通常被划分为返乡前和返乡后两个阶段，后者可进一步分为创建期、存活期和成长期[23]。在上述文献研究基础上，制定如下创业阶段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每个阶段均对应特定的创业目标。结合河南省L县15位返乡创业经济精英的案例，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重点探讨该群体返乡后的成功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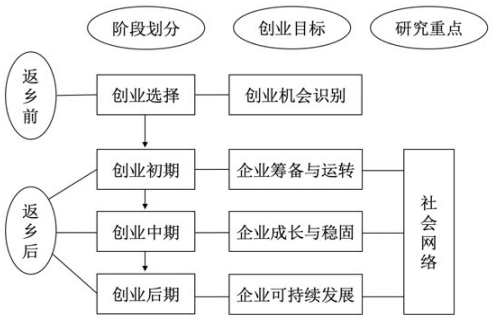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创业阶段分析框架

三、研究地点与研究对象概况

L县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个部委确定的“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也是河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确定的“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试点”。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该县大力推行招商引资政策，设立返乡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一方面大力支持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另一方面依托老乡会和商会的纽带作用吸纳拥有本地籍贯且身在外地的企业家回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创造在地就业机会，使“外出务工潮”向“返乡创业潮”转化。选取该县作为田野地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展现出全省乃至全国返乡创业的图景。

L县县委县政府自2008年起连续举办“返乡创业之星”评选活动，每年在全县范围表彰约10名具有开拓精神、遵纪守法、业绩突出的返乡创业者，通过树立典型激发全民创业热情，营造支持创业和繁荣经济的良好氛围。笔者参与了L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在2018年初组织的近百人规模的返乡创业成功人士座谈会，把握契机获取部分参会者的联系方式，于2018年、2019年、2021年期间对多位返乡创业者进行深度访谈，并实地参观其企业。从中选取15位较为典型的经济精英作为研究对象，其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编码	学历	行业/核心产品	政治职务	商会职务	原所在地	原行业
A1	高中	食品/饼干	县人大代表	L县扶贫企业联合会会员	广东	食品
A2	高中	机械制造/吊车、起重机	县人大代表	L县民联商会副会长	浙江	船坞制造
A3	中专	建筑劳务	L村支部书记	郑州市L县商会成员	郑州	建筑
A4	高中	地产置业	—	郑州市L县商会副会长	郑州	建筑
A5	本科	食品/瓜子、酱	政协委员	L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郑州	设计、食品
A6	高中	煤炭重工	—	郑州市L县商会副会长	郑州	五金、家具
A7	大专	食品/馒头、豆腐乳	政协委员；A村支部书记	—	上海	家电销售
A8	大专	乐器/古筝、古琴	政协委员	L县工商联副主席、乐器协会副会长	山西	建筑
A9	大专	食品/花生奶	政协常委	L县扶贫企业联合会会员	上海	汽修、建筑
A1O	高中	木业/家具	—	Y乡商会副会长	河北	材料、家具
A11	高中	食品/水果罐头、食用菌	人大代表	L县扶贫企业联合会法人	郑州	食品
A12	初中	商砼/水泥	P乡工业园区支部书记	P乡商会副会长	山东	粮油
A13	初中	乐器/古筝	—	L县乐器协会副会长	开封	建筑
A14	初中	牧业/奶制品	政协常委	河南省山东商会副会长	郑州	牧业
A15	本科	食品/小米、酱品	—	L县小米协会会长、北京市L县商会会员	郑州	计算机培训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L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资料和深度访谈材料

具体来看，在性别比例上，A1至A14均为男性，只有A15为女性，基本符合L县经济精英男多女少的分布态势。年龄方面，最小者A9为33岁，最大者A4为59岁。访谈对象的文化水平

参差不齐，初中以上学历有12位，其中本科学历2位，大专学历3位，高中学历6位，中专学历1位。他们的创业领域广泛，产品类型多样，涉及食品、机械制造、房产、劳务、乐器和牧业等。所有受访者在返乡前均有一定的经营经验或社会资本，例如曾在省外经商或务工的有7位，而在本省省会城市的同样有7位。在15位研究对象中，A1到A10获得“返乡创业之星”荣誉称号，剩余案例也被公认为是当地返乡创业相对成功的人士。因此，综合创业规模、企业成效和外界评价等标准，这些人可被视为返乡创业群体中的经济精英，基本契合本文研究对象的特性要求。

L县15位返乡创业经济精英的案例表明，在经历“离土离乡”的脱嵌状态后，其是在内在基因和外在契机的综合推动下决定把个体的社会网络向乡土的社会网络进行回嵌[24]。首先，家庭团聚的需求和乡土文化的熏陶是他们主动返乡创业的重要诱因。许多外出创业的经济精英长期与亲人分离，独自承受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面临着夫妻关系冷淡、子女互动缺失、照料父母不周等问题，他们在经济增收和家庭幸福的目标平衡中萌生了返乡的念头。其次，产业发展机遇和政府优惠条件进一步坚定了其返乡创业的信心。在城市创办的企业陷入了瓶颈，而基于地方历史和特色的产品逐渐受到消费者青睐，由此他们敏锐地捕捉乡土事物与创新思维相交融的商机，返乡寻找产业发展的新出路。加上当地政府的邀请和扶持，招商引资的行政任务压力使得政府倾向于寻找知根知底且具备一定资本的经济精英返乡，这其中蕴藏着政府的绩效竞技和精英的资本集聚的共谋行动逻辑。最后，内外在要素共同塑造了个体发展与乡村发展一体化的思路，经济精英从脱嵌状态转变为返乡创业的回嵌状态，同时也在推动个体的社会网络重新融入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的进程，逐渐产生二者资源叠加和互补效应。

四、经济精英创业阶段的社会网络变迁与功效

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战略目标不同，资源需求也存在差异。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案例的实际情况，将所研究的企业周期主要划为三阶段：处于创业初期的企业年限为3年及以下，处于创业中期的企业年限为4～6年，处于创业后期的企业年限为7年及以上。

（一）创业初期：非正式网络为主导

经济精英在创业初期主要依靠非正式网络实现企业的筹备与运作，其经济行动体现情感型资本特质。

1. 结合个体经历选择相关行业

纵观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的案例，访谈结果得知，其中40%的创业与返乡前从事行业基本一致，20%的创业与返乡前从事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剩下40%的创业虽与返乡前从事的行业完全不同，但也深受地方特色产品或家族传承产业的影响。

“在小时候，父母做副食品代理批发生意，其中饼干销售状况较好，于是我高中毕业后去广州的饼干厂打工，正规地学习饼干制作工艺。打工两年多后，学到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并结识了销售方面的人脉，获得很多客户信息。”（A1，20190121）

“父亲曾经到民族乐器厂打工，当时老板经常让父亲外出给客户修琴，逐渐认识了一些客户。其中一位琴行的老师，提议让父亲单干，他愿意协助销售，父亲之后就开始自己筹备乐器厂。我原本在外地当建筑工，工作辛苦且赚不到钱，后来回家跟着父亲学手艺，父子携手创业。”（A13，20180106）

以往的从业经历使创业者掌握行业的基础知识，提升了专业技能和积累运营经验，一方面消减了行业壁垒和降低创业差错率，推进商业意识的更新，把生态、健康、创新等崭新理念运用到产业发展之中，另一方面拓展了个体的社会网络，从而实现人脉资源的有效稳固与转化。

2. 基于信任关系获得初始资源

一般而言，初创企业风险性较大，绩效较难预期，其发展前景较难获得外界的普遍信任。因此，在创业初期，经济精英的初始资源主要来源于以血缘和地缘维持的圈层，非正式网络主体基于信任关系和情感基础向其提供资源支持，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信息和资金供给等方面。

“创业初期的生意并不稳定，陷入资金周转困难的瓶颈，由于没有抵押凭证而无法贷款，所

以只能向亲友筹借资金。许多童年玩伴出资帮我，他们在我失意时也鼓励我。”（A1，20190121）

“我最开始创业的大部分资金都是亲戚朋友借给我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发不出工资了，我的老丈人把自己的两头牛卖掉来支持我。”（A3，20181005）

通过访谈得知，资金周转问题是创业初期的最大障碍，特别是承接一些中大型项目时，往往需要企业垫付款项。许多创业者缺少资产抵押物，难以从审查严格的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援助，即使得到贷款，其金额也较小，而不得不运用非正式网络向亲友借款。此时的抵押物从物质资产转化为恩情、名誉、承诺等由信任维系的无形资产，由此中国情境下的密切私人关系孕育出富有经济意义的商业关系[25]，协助返乡创业者走出资本短缺困境。

3. 依靠人情原则支撑企业运营

基于信任关系的资本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返乡创业精英需要采用人情原则运营企业。通过访谈得知，几乎所有初创企业的核心员工均是家人或是相熟的老乡和朋友。

“我90%的员工都来自周边村庄，跟随我外出创业的许多老员工也跟过来。在厂区筹建时期，为了保证质量和节约成果，我常常住在工地，与工人们一起劳动。”（A5，20180105）

在创业初期，创业者与员工存在感情纽带，企业内部制度并不健全，职能分工也比较模糊。因此，经济精英主要运用以宗族、乡邻、惯习等传统约束规则为代表的传统型权威开展企业管理工作，人情色彩浓厚。此外，与供应商和客户打交道更多依靠人格魅力，有时可从供应商处赊账，销售渠道则主要通过朋友圈子拓展。

（二）创业中期：正式网络作用凸显

在创业中期，基于地缘、亲缘的内部关系网络依然重要，同时，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正式网络的作用逐渐凸显，经济精英转向依靠正式网络实现企业的成长与巩固，其经济行动体现理性型资本特质。

1. 基于契约关系推动资本积累

创业是个持久投入的过程，在创业中期，亲友的支持已难以满足扩大创业规模的需求，经济精英需逐渐突破原始圈层的局限，参与一系列社交活动以增强外部联系。此阶段社会网络从内卷化转变为外延化，越来越依靠由契约关系主导的正式关系网络来实现资本积累，政府、银行、客户、科研机构等主体的扶持作用日益凸显。

“政府部门提供了许多帮助，例如我厂里的很多员工都是通过人社局的网站招聘而来，工商部门则经常邀请我们参与企业展会，提供机会让我们宣传产品，慢慢地打开了市场空间。”（A7，20190123）

“在L县政府的协调下，公司与中国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出台乐器联保政策，中国银行为公司提供无息贷款，使公司的产值迅速扩大。”（A8，20190124）

政府倾向于将资源投向那些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企业，这是官僚绩效压力型体制与企业资本增殖共谋的结果，有助于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担保下，转型期企业能更顺利地获得银行的融资。企业同行通过展览会、商业合作等方式交流运作经验、共享市场信息、实现业务互补，丰富陌生人客户群。科研机构和学者的指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创业者启发，使其找准发展方向，突破发展瓶颈。

2. 注重打造品牌拓宽发展空间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质量和品牌标准，因此经济精英在创业中期注重技术的革新，并且在品牌营造上付出诸多努力。

“做企业就是做产品，只有规范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过硬的产品质量才能支撑起企业未来的发展。我通过银行贷款建立了二期厂区，购置了更加先进的生产设备。为了解决客户购买起重机上牌困难的问题，先后与几个汽车公司联合取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上牌公告。之后又取得国家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A2，20181007）

许多初创企业在早期主要代工他人品牌，加上中间层级的代理商的利益提留，使企业收获的利润点较低。经济精英在创业中期重视商标和包装专利的注册工作，积极申请质检认证和特色产品称号，打造富含企业文化的品牌，配套良好的服务，逐步扩大市场影响力，更大幅度提升利润空间。

3. 强调实用主义促使运营规范

企业的逐利属性愈发凸显，偏向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迈入从家族式松散企业向现代科层型企业的转型过程，各种规章制度变得规范化。

“创业中期需要逐步淘汰一开始的人。花同样的价钱招募员工，外人会卖力地干，而亲戚却不好好干，难以管理。我在这一阶段也不准家人参与公司管理，因为他们可能会顶撞你，企业内部出现多种声音，这是不利于命令执行的。”（A9，20181004）

家族式治理模式在企业规模较小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期也可能成为企业蜕变的阻碍。对同种资源的依赖性使熟人之间易爆发利害冲突[26]。不少家族企业因人情规则下的寻租和腐败、内部派系斗争、治理机制变动频发等而走向衰落。所以许多经济精英不允许亲友插手企业管理工作，通过塑造法理型权威以克服非正式网络的负面作用。此外，部分创业者受工具理性蒙蔽，无节制地榨取本土资源，这种“杀熟”行为具有精英俘获的意味。

（三）创业后期：正式网络为主导

经济精英在创业后期除了明确运营方针，提升产品质量，培养骨干团队，巩固客户群外，更关键的是要通过拓宽社会网络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经济行动体现互惠型资本特质，追求义利的有效结合。

1. 依托政治和商会职务助力长久发展

政治和商会职务依托法理章程赋予了经济精英以组织成员身份，还通过内部会议和活动等方式逐渐增强成员间的交往频率，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换，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身份是价值较高的个人荣誉，也有助于及时把握政策信息，企业由此跟着沾光。在谈生意的时候，往往能使对方多一份信任。”（A7，20190123）

“作为一个商人，在投资了那么多钱后，便要去争取政治资源，政协这一平台让我结识了许多领导和朋友，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A9，20181004）

当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发展态势良好，且在当地影响力较大时，其与政府的来往会愈发紧密。从政府的角度看，该类型企业已经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有效地缓解群众就业和贫困等难题，应赋予企业家更多的话语权，特别是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誉吸纳他们，从而组成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统一战线。从企业的角度看，透过政治身份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能更及时准确地把握政策意涵，帮助企业构建发展的良好环境，从而规避市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经济精英凭借此类身份可有效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有利于顺畅地对接外部资源。

“2013年在政府的引导下组建了乐器协会，我担任副会长。这是行业性协会，功能是组织交流活动，比如开展会议探讨技术问题，以协会的名义举办展会，出面协助困难企业融资等。这几年整个县的乐器产业的健康发展，与协会这个大平台是分不开的。”（A13，20180106）

此外，不少经济精英参加商会组织，这一网络同样发挥着重要的资源链接功能。商会实质古已有之，这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组织形态，成员大都具有乡土情结，对家乡地方发展等事务存在强烈的责任感。一般而言，商会成员会定期见面，共享行业信息，平等地商讨决策，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解决问题，保持较为密切的交往。同时商会作为企业与政府、外界经济组织和乡土社会的重要沟通桥梁，能更有效地消除合作摩擦，最终提升合作效益。

2. 践行社会责任进行深层乡土帮扶

企业家承担政治职务的政治与经济二重性，以及商会的企业联盟和同乡会的二重性，使经济精英从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税收等表层性社会贡献，逐渐成长为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地方经济复苏、乡村振兴工作的深层次乡土帮扶。

“我们主动安排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安置下岗工人再就业，为帮助贫困户脱贫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和优厚的福利待遇。我们每个人都来自这个社会，只有心存感激和敬畏，我们的创业道路才会越走越宽。”（A2，20181002）

“2000年，支援家乡小学建设资金10万元。2013年，捐助6万多元为家乡小学更换桌椅。分别在两个乡镇建立爱心超市，还以公司为单位投资20余万元支援20个贫困户。”（A4，20190116）

总体来看，不少返乡创业精英具备一定程度

的“经世济民”精神，变身为脱贫致富带头人，其企业也被评为扶贫先进单位。他们以身作则地捐献资金、修葺村路、美化乡村环境、资助贫困学生、慰问长者、举办文体活动，并号召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帮扶事业，盘活乡土资源格局，营造良好的互助氛围。他们发挥企业优势，带动农民实现经济增收，例如提供职业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素养，优先安排弱势群体就近就业，与村民签订原料提供协议，或者运用企业现有的销售渠道协助农户卖出滞销产品，保障其基本收入。在承担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返乡创业精英及其企业进一步融入乡土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相对坚实的发展基础。

3. 嵌入乡土社会实现网络互构耦合

互惠导向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促使经济精英深度地扎根乡土社会，其企业随之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推进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的社会网络的互构耦合，达成真正的“回嵌”进而“融入”的状态。

“我们做公益的动机是贡献微薄之力，政府、村民等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也要回报他们。有一句话叫‘厚德载物’，你所有承载的这些物质就要靠你的德来承载。”（A5，20180105）

“我们当时组织了一场公益活动‘一碗粥温暖一座城’，免费让孤寡老人、街上的环卫工和交警等品尝我们的小米粥。他们一尝觉得挺好喝的，黏糊糊的，是小时候的味道。当时有领导正好经过公园，把这个事汇报给县里。后来我们的小米被推荐到国务院扶贫办，许多政府单位争先购买，三个月卖完了八万斤。第二年便申请绿色有机认证，成功把L县小米品牌建立起来。”（A15，20190118）

经济精英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盈利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这种互惠行动对个体的社会网络和乡土的社会网络均有所增益。经济精英将自身的资源禀赋引入到乡村场域，树立良心企业家的道德形象，以便于企业在后续发展中赢得政府的认可和消费者的青睐。由此可见，做公益可以增添无形的社会资本。换言之，经济精英与乡土在社会网络的深层交织中达成了互利共生的动态均衡，双方的力量均得到壮大。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在“外出务工潮”往“返乡创业潮”转向的宏观背景下，不仅要推动农民工群体返乡创业，更应积极引导经济精英回嵌乡土，这对构建人才及其承载的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根据创业过程剖析经济精英的返乡创业现象，可发现该群体的创业目标实质伴随着企业的发展阶段而产生大致相似的变化，即选择阶段为返乡创业机会识别，创业初期是企业筹备与运转，创业中期为企业存活与稳固，创业后期则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路上，社会网络均发挥着关键作用。

文章选取了河南省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的案例，从社会网络切入来探索该群体返乡创业的成功要素，这些鲜活案例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该县乃至国家的经济精英群体返乡创业的现实图景。调研结果显示，经济精英普遍基于内在基因和外在契机的综合效应而作出返乡创业的决定，这一方面反映了现代与传统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紧迫张力，另一方面造就了将个体的社会网络逐渐回嵌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的结果。针对各个创业阶段的不同目标，发挥核心催化作用的社会网络类型也发生了变迁。具体而言，在创业初期，经济精英的行动以非正式网络为主导，直接影响其行业选择、初始资源，且在运营模式上的人情倾向明显；在创业中期，对正式网络依赖性增强，通过建立契约关系推动资金积累、打造企业品牌，逐渐转向实用为导向的规范经营；在创业后期，规模扩大使其具备政绩效应与社会效应，虹吸正式社会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深度融入和扎根于当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经济精英的企业资本属性从情感型资本转向理性型资本和互惠型资本的嬗变过程，最终促成了经济精英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的社会网络的互构耦合，催生资源整合和叠加效果。

（二）政策启示

鉴于社会网络在经济精英返乡创业行动过程的作用规律，提出如下优化对策。第一，政府完善支持返乡创业的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手续、给予税收优惠等手段，为经济精英返乡创业提供便利条件。同时进行正确

的价值宣导，提倡共同富裕，促使经济精英在实现个人利益增长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第二，一方面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便利，另一方面可采取资金互助的形式，将乡土社会的闲置资金联合起来构建互助资金池，完善信任借贷和监督机制，协助企业渡过资金周转难关。第三，培育多样形式的行业组织，同时鼓励和吸纳经济精英担任政治职务，依托这种兼具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特性的互动关系提高其创业成功的可能。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现象背后仍潜藏着许多值得反思的议题。首先，众多案例表明该群体的行动已经超越精英俘获和寡头治村的传统解释范畴，而存在互助共赢与多元共治的建设性面向，特别是将个人的资金、理念、技术、关系等资源带回乡土，以卡里斯马权威推进农民觉醒和再组织化，实现个体与乡土的协同发展，同时也服务于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助推实现共同富裕。另外，经济精英相较于普通农民工具备多方面的条件优势，但社会网络要素对这两类群体创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故关于提升经济精英返乡创业成效的思考和对策可对其他群体返乡创办微小企业起到一些借鉴作用。最后，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的实践经验指示着社会网络构成的动态变化，然而其与创业成功可能性的交互程度仍需严谨的量化研究加以佐证，感兴趣的研究者可遵循这一方向进行探索。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EB/OL]. (2018-03-07)[2021-12-25]. http://www.gov.Cn/xinwen/2018-03/07/Content_

[2] 王西玉，崔传义，赵阳. 打工与回乡:就业转变和农村发展——关于部分进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研究[J]. 管理世界，2003（7）：99-109，155.

[3] 刘美玉.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机理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3，34（3）：63-68，111.

[4] 贺雪峰.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逻辑与风险[J]. 求索，2020（2）：4-10.

[5] 陈国生，肖瑜君，李海波，等. 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465户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J]. 经济地理，2022，42（1）：176-181.

[6] 石丹淅，王轶.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政策促进[J]. 求是学刊，2021，48（1）：90-101.

[7] 朱红根. 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江西调查数据[J]. 财贸研究，2012，23（1）：18-26.

[8] 李敏. 大众创业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探究[J]. 中州学刊，2015（10）：79-82.

[9] 黄晓勇，刘伟，李忠云，等.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6）：66-72.

[10] 古川，尹宁，赵利梅. 社会网络与产业生态交互赋能下青年返乡创业的演进机制[J]. 农村经济，2021（9）：128-134.

[11] 庄晋财，芮正云，曾纪芬. 双重网络嵌入、创业资源获取对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影响——基于赣、皖、苏183个农民工创业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4（3）：29-41.

[12] 张思阳，赵敏娟，应新安，等.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互联网嵌入视角[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41（5）：783-792.

[13] 杨学儒，邹宝玲. 模仿还是创新：互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实证研究[J]. 学术研究，2018（5）：77-83.

[14] 陈昭玖，朱红根.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支持的可获性研究——基于江西1145份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11，32（5）：54-59，111.

[15] 何慧丽，苏志豪. 返乡青年何以返乡？——基于主体性视角的考察[J]. 贵州社会科学，2019（10）：72-78.

[16] 赵利梅，张凤，易晓芹. 乡村振兴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双螺旋耦合机制研究——以四川省平武县GB村为例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2020（12）：49-57.

[17] 刘腾龙.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转型——基于乡村青年创业精英的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2020（2）：58-66，84.

[18] 张慧泽，高启杰. 新农人现象与乡村人才振兴机制构建——基于社会与产业双重网络视角[J]. 现代经济探讨，2021（2）：121-125.

[19] 林龙飞.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逻辑——基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9（10）：62-68.

[20] Mithell J.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J. Mitchell (Eds).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

[21] Birley, Sue. The role of networks in the entrepreneur-

ial proces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85, 1 (1): 107-117.
[22] Littunen H. Networks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0, 15 (5): 59-71.
[23] 蔡莉，单标安. 创业网络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创建期、存活期及成长期的实证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4)：189-197.
[24] 潘家恩，吴丹，罗士轩，等. 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中国乡村建设的源起与内涵[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 (1)：120-129.
[25]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89.
[26] 郑也夫. 走向杀熟之路——对一种反传统历史过程的社会学分析[J]. 学术界，2001 (1)：58-76.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of economic elites returning rural areas to run businesses —— taking L County,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ONG Yun[1], SU Zhihao[2]

(1.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Studies,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ow,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conomic elites have unique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cases of 15 entrepreneurial elites who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s in L County, Henan Province, the paper,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s an entry point, analyzes the success factors of these economic elites after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turn of economic elites to start a business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twining of internal genes and external opportuniti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l networks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which directly affect industry selection and original accumulation, and the human tendency in the operation model is obvious. In the middle stage, the utility of formal relationships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are formed to promote capital accumulation, brand build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traditional human-feeling operation model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practical-oriented standardized operation. In the later stage, the scale expansion has enabled it to have political performance and social effects, siphoning formal social networks and informal networks, deeply integrating and taking root in the local area, and becoming the backbon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ength. This process is the in-depth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elites and localized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cies, and realiz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with local reality.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e can start from the capital mutual coupling effect formed by the social network of economic elites and the native social network of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 the elites return home to run business.

Keywords: Return rural areas to run business; Economic elites; Social network; Rural revitalization

(编辑：程俐萍)